

乡村文化复兴与乡土文明价值重构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 100091)

摘要:乡村振兴既要物质塑形更要文化铸魂。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复兴旨在实现一种乡土文明价值重构,它关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的厚植。乡村文化复兴之于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它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厚植“中国特色”的价值难以尽述,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石之一。乡村振兴的意蕴指向的是经由乡村文化复兴,实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从而推动“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建构。建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是以二者互补交融发展为乡村文化复兴寻求内在理据,进而从理论上明白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独特性所在,并为乡村振兴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张扬“中国特色”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点。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乡土文明;“再乡村化”;“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 127;G 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6-0005-09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伴随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现实发展实际来看,所谓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所谓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薄弱环节,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农村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可以说,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能否打造若干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将直接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在笔者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乡村文化复兴为基础和前提,所谓乡村文化复兴,是指在

肯定乡村文化的本体地位和现代价值的同时,正确处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旨在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以乡村文化的复兴,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现代化进程中厚植“乡村中国”的文化底蕴,改善农民的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乡村维度。乡村文化复兴之于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它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厚植“中国特色”的价值难以尽述,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之一。

一、乡村振兴既要物质塑形 更要文化铸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收稿日期:2019-09-15

作者简介: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文艺学和文化研究。

铸魂。乡村文化复兴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于乡村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有着诸多的价值引领作用。如何发展和发展什么样的乡村产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关键点。乡村振兴需要以产业支撑实现物质塑形,更需要经由乡村文化复兴为之铸魂。如浙江湖州市安吉县的余村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其乡村振兴实践在硬实力赋形方面,就立足产业支撑实现了包括投资1 000多万元建成文化礼堂、数字影院、文体广场、文化舞台、灯光球场、农家书屋、矿山遗址公园、慢行绿道、智能垃圾收集设备、分类下水管线铺设等设施,为乡村文化复兴筑牢载体;而在铸魂方面,则制定了《余村村庄规划》,完善了《余村村规民约》等,为村民的日常生活践履提供了基本遵循。只有实现有形的和无形的协调统筹发展,才能打造各具特色的“富春山居图”。在现代化格局中实现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要着重发挥文化的价值感召作用,通过城市反哺乡村,以文化吸引资本,推动产业扎根,不断提升产业的品位和粘性,只有在文化气质上的相互契合才能使产业成为生长在乡村大地上的大树,而不是单纯逐利的资本独舞。当然没有可盈利的利润回报,产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高扬文化的价值,旨在文化的润泽下校正资本的贪婪本性,在与乡土文明的契合中采取适宜的态度。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正视现实基础。当下,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上楼”,乡村文化日渐萎缩,“空心村”问题不时涌现,与之相应的是“城市病”的顽疾愈益引发关注,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对问题的解决不能仅盯在乡村自身建设上,而是要有城乡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思路 and 理念,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视野与格局。从乡村文化复兴的视角看,需要尊重乡村文化的本体地位以及和城市文化的相互支撑与相互补充的共在性,而非持守二元对立式的先进与落后之别的陈旧观念和僵化思维。也就是说,乡村振兴要有乡土文明复兴的价值指向,其前提和理念是“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意识,这是乡村文化复兴的价值参照系和发展方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取代乡村、乡村像城市,而是相互尊重本体性

存在,以文化的独立维护人的尊严,使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得到尊重,每一个人都能体面地生活。“现代城乡一体化”的理念需要文化支撑和文化价值的润泽,乡村振兴旨在弘扬乡村文化的本体价值,推动乡土文明在与时代条件相结合中复兴,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乡村民间民俗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尊重乡村文化本体地位的基础上,建构具有超越传统城乡二元对立、以城市文化遮蔽或替代乡村文化的陈旧思维,从而促进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进而夯实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这在当前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迫切的实践。

第二,乡村文化复兴旨在为乡村振兴铸魂。在实施策略上,乡村文化复兴需要着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和特色文化产业,尤其是不能机械地理解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而应尊重乡村文化的区域性、多样性、差异性、时代性,倡导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一村一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对乡村文化事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工作实践中,就是要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大力提升服务效能;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如浙江嘉兴市倡导“城乡前行肩并肩”,使农民与市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图书馆之间一卡通行,农民在村里的文化礼堂借书与市图书馆并无二致。截至2018年底,浙江仅图书馆乡镇分馆就有894家,农村文化礼堂7 851家,一个布局合理、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经形成。“多读书本,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这是浙江文化礼堂显现出的“以文化人”的生动写照。

在实践上,推动现代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乡村文化复兴,还要把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发展特色产业振兴相结合。首先是把乡村文化服务做成特色产业振兴的载体,使乡村文化的综合价值在文化蓬勃发展中得以彰显。乡村文化复兴要在文化供给上做文章,活跃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一方面,

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层文化设施条件,广泛组织优秀文艺作品进农村、进社区,提升乡村文化生活质量,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使留在乡村的人能够安心,使那些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加有信心。另一方面,注重培养乡村文化能人,加强文艺培训辅导,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引导群众自我表现、自我展示,变单纯的“送文化”为“种文化”与“送文化”相结合,使文化的“种子”在乡村文化复兴中发芽、开花,以文化的大地性激发出丰富乡村文化供给的内生动力。实践证明,乡村文化复兴是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农村文化发展不充分的有效手段,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保障,因而要把乡村文化复兴贯穿实施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全过程。

其次是充分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大力振兴传统工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通过产业发展让农民脱贫致富,使青年农民愿意在乡村扎根,并吸引城市人才到乡村创业,实现城市与乡村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事实上,丰厚的乡土文明往往积淀了很多有特色的文化活动与产品,需要发掘文化的眼光和增强创意转化的能力,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以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多样性业态融合发展为切入点,积极培育和拓展新主体(自然人和公益组织),发展内容产业,以内容创新激活乡村文明资源,在乡村文化复兴中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如四川雅安的茶马古道、贡茶文化、藏茶等在“茶旅融合”发展中,既推动了乡村文化复兴,又实现了文化品牌效应),不断延伸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农业、休闲体验、创意文化产业)链条。当前,新时代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更多地显现于作为产业形态的文化,文化创意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创意作为一种特有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一样,越发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因素。在新的视野下,文化创意可以充分发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同时,文化创意本有的强渗透、强关联的效应,有效地促进了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值。如文化创意可以与农业融合,发展田园综合体、休闲农场、乡村营地、农业庄园等业

态;可以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乡村特色文化公园、乡村文化生态博物馆、艺术村、艺家乐等;可以与传统手工艺融合,发展草柳编、中国结、工艺品生产等;可以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古村落来说,文化旅游发展空间巨大,效益显著。

此外,乡村文化复兴还离不开文化空间场景塑造的支撑。近年来,“场景理论”开始被引入到乡村文化空间的品位塑造上,如通过建设乡村博物馆、文化站、文化广场、农业遗产带等,既展示了农耕文明厚重的文化积累、历史记忆,又把乡村特有的生活品位营造出来,使乡愁有所附着。场景是文化空间与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的交融,通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重构了乡村新的生活方式,假借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技术融入乡村文化复兴,文化的力量开始彰显,农民的文化归属感和获得感有所增强。说到底,乡村文化复兴旨在提升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在回归乡村文化本位中凸显乡土文明价值。其实,无论是美丽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建构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是旨在使乡村变得有意义、有意味、有魅力,能够吸引人、留住人,在化解乡村“空心化”问题中发展产业,使乡村变得宜居、宜业,从而为实现乡村文化复兴奠定基础。可见,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更要复兴文化,尤其是培育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乡村文化复兴有助于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协同共建。以产业立基,筑牢乡村振兴的逻辑骨架,强化农民就业的在地性,这就是以产业为乡村振兴赋形。乡村振兴如若缺失经济支撑,根本就留不住人,何谈文化共同体建设?同样若没有文化价值引导,缺失普遍遵循的价值规范,个人私德在没有公德约束下,往往会无限膨胀,乡村经济即使暂时发展起来也会走不远。以乡村文化复兴树立价值标杆、润泽人心,这就是以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有了文化生活的激活,才能真正集聚人才、产业,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乡村生态。

第三,新时代语境下乡村文化复兴要积极践行“两山理论”。“两山理论”不仅是一种生态文明观,也是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观,以生态文化价值引领乡村文化复兴就使乡土文明重构有了现

代价值指向,使乡村文化复兴有了现代性视野。通常,乡村环境的改善,整洁的村容村貌,乡村民居与自然环境的错落有致,人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对乡村文化肌理的一种重构,使乡村文化复兴有了现代性质地。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化理念,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倡导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自觉。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对生态文明的精神追求,这是当前乡村文化复兴的内容创新。生活方式的转变使乡村文化复兴有了依托。同时,通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在重构一种乡村生活方式中激活传统文化思想,使之与当代条件相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知常曰明”强调环境保护意识;“知和曰常”强调生态平衡观念;“知足寡欲”强调适度消费观念,等等,在今天的现实文化中重现思想的光辉。因此,伴随乡村文化复兴、村民文化意识的增强,乡土文明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理念得以彰显,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

二、在乡村文化复兴中 重构乡土文明

中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由此而生的乡土文明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薪火相传的根本,可以说乡土文明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根基。乡村文化作为乡土文明的结晶,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农民的精神生活,引领农村良好社会风尚,有着难以尽述的价值。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1]。文脉的传承需要接通生活,融入当下文化实践,因而只有传承提升乡土文明的现代价值,乡村文化复兴才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这

样的理念和实践,应该在乡村振兴中成为一种普遍性遵循。

回望过去,在社会急剧变革转型期,伴随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现代文明不断蚕食乡土文明,乡村文化遭遇现代城市文化的碾压而日益边缘化。直面现实,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入拐点时刻,中国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如何定位乡村文化和乡土文明的地位?将直接关乎乡村文化的复兴和乡土文明的价值传承,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彰显。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是基于他长期以来对城乡关系思考的理论升华。其核心是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3](P603)。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理念上明白,“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4](P605-606)因此,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不是求新,而是多在保护与弘扬乡村优秀文化上下功夫,加大对古村落、古建筑、古文物等乡村物质文化的整修和保护,杜绝一切可能毁坏历史文物的行为;努力发掘一些民间民族表演艺术、传统戏剧和曲艺、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族服饰、民俗活动、民间传说、农业文化遗产、口头说唱艺术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延续良好的民风、民俗等村落的“文化根脉”,在乡村文化复兴中使乡土文明的精髓与现代文明因素相交融,使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真正激活乡土文明,焕发出乡村文化的力量,使乡愁落地生根,使乡村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中华文明的守护者。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鄂州市的长港镇峒山村调研时就曾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在他看来,“记得住乡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青山常驻、绿水长流。有了产业支撑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的美化,才能重构一种可以亲近大地、走进自然、从容健康的乡村慢生活,从而与快节奏紧张

的城市生活构成一种互补,乡村才是中华民族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乡村文化复兴,说到底亦是精神家园的重构,它可以支撑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品位的优秀民族,使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成为高位态的民族文化。

从历史性生成来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有着中国历史传承发展的根茎,中国古代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以血缘、宗亲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社会,其社会基础就是乡村,中国古代以乡村为主导的共同体是把城市文化也囊括其中的。固然,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城市,政治权力多集中在城市和军事重镇,但农村经济的基础作用十分深厚,乡绅的力量十分强大,虽然城市文化颇有规模,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却扎在乡村,在性质上二者是一种同构性关系。仅有城乡“活法”上的差异,在符号表征、节日仪式等“说法”上却几近一致,它们共同支撑和丰富了多姿多彩的华夏文明,其中的连接纽带就是“乡土记忆”。“乡土记忆”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在乡村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土地情结”(土地崇拜),在城市则表现为浓烈的“故乡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乡愁美学”。厘清了中华文化的根脉和历史根茎的独特性,就会明白倡导“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有其历史的文化心理基础,明白容易导致文化迷失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岔路口”何在,也更会明白“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不是追求一元,而是在契合文化现代化趋势中,尊重各自本性与独特表达的本体地位基础上的多元共在,是主导性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建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是以二者互补交融发展为乡村文化复兴寻求内在理据,进而从理论上明白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独特性所在,并为乡村振兴奠定深厚的文化理论基础,为张扬“中国特色”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现实文化支点。

作为阐释乡村文化复兴的关键词,本文在理念上认同“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术语表达,对此的界定已经有学者做出阐释,“以促进城乡文化认同为前提,以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为旨归,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新型文化共同体,它具备现代理性精神,包容

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又以共同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形象、文化记忆等为精神纽带和情感基础。”^{[4](P9)}说到底,“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不是一体,而是多元主体共在的“和而不同”,它契合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诉求及其生存状态。它既是一个立足全球化语境的现代价值取向的观念,又是一个追求价值共识的文明观念,旨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现代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需要政策推动,需要有形载体建设,但并非就是广电网络村村通,定期送文化下乡,建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灯光篮球场、文化云等,这些固然需要,尤其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均等化,但更重要的是让文化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一种乡土文明意识的蓬勃发展。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只有在尊重乡村文化本体地位基础上,才能构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其所谓“现代”,强调的是一种先进理念——信息文明语境下的现代性观念,要有生态和谐的文明观、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观、民主政治的社会治理观、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观,以及培育新时代农民新人的成长观。一定意义上,乡村文化复兴有着某种“再乡村化”的意味,它不是简单地回到乡村的“过去”,而是一种现代条件下的新生,不仅是一种乡村文化空间的再构,而且还是一种乡村新人的成长,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并显现于城乡一体化的共在,在根本上是一种“返乡”中的价值重构,目标是指向一种新乡村的前景。在根本上它是对当下文化发展中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失忆与文化认同危机的问诊,旨在增强社会的向心力、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使中华民族成为“魂体合一”的人格健全的文明的理性的民族,使城市和乡村都成为诗意栖居之所,在多样化生活方式的相得益彰中和谐共在。因此,乡村文化复兴不再是文化断裂下的话语批判、启蒙与革命等叙事,而是在肯定其独立的本体地位基础上的价值阐释。首先,诚如上文分析的,乡村文化复兴要与生态改善、产业振兴相关联,藉此为乡村文化复兴夯实载体基础;其次,正如上文所强调的,乡村文化复兴要与人才振兴和新农民的培育以及乡村组织建设相结合,为乡村文化复兴培育主体力量;最后,乡村文化复兴不能沦为空洞的口号,要有因地制宜的文化活动以及特色文化

产业为抓手,使现代意味的“乡愁”有所附着,在生态、生产、生活的合一中推进“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建设,在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中,使乡村文化显现于农村日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使乡村美学成为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生长的家园。惟此,“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包容着多元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它不仅吸纳、融合了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形态的要素,而且吸纳、包容着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最后,它有着多层次的互动性,共同体内的各种文化元素不是松散地聚合到一起,而是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相互联系,在互动过程中生机勃勃,从而不断生长、更新、发展,而不是像传统社会的城乡文化共同体那样具有一种超稳定性。”^[4](P283)就其可能的形态而言,现代化是其复兴方式,但无论是“再发现”还是“新生”,都不是与传统的某种断裂,而是一种赓续和传承。正如各地如火如荼的家风家训的文化遗产,就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载体,也是今天乡村文化复兴的某种现实支点。以之为点散播开来,由此所弘扬的仁、义、德的观念就是乡土文明的价值彰显。

三、乡村文化复兴热中的冷思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当下广泛性的全域旅游的如火如荼,乡村文化复兴开始“热起来”了,一些乱象萌生。对此,有学者开始反思:晴耕雨读变味了,文创与花海在代替乡愁;剪纸舞狮消失了,艺人非遗被卖到景区;古村古镇变味了,绿化、硬化、亮化、规划,已让它们变性了。传统村落,仅仅10年内减少了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座村落(微信公众号“北京绿十字”第1102期,孙君文)。载体的消失徒留下浮与潦草的皮毛,打着“非遗”的旗号在旅游开发中做着某种经济“征召”的噱头。相对于当下乡村游中各种赝品、表演性仪式、陈规陋习的沉渣泛起,我们必须明白,乡村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缺失灵魂的仪式只是唬人的文化躯壳,幌子不能成为文化的指征,文化复兴一定是“魂体相符”,并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因此,乡村文化复兴是立足现代化发展趋势有

着现代文明的价值指向,是切合当下社会语境的一种发展。中国古代乡村基本结构的家国同构内涵与当下社会的家与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传统社会是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家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体现的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如《大学》有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仁义礼智,德行依家族而彰显;君子淑女,人格因家教以昌明。家风族训,乡规里约,虽然往往散布而不显,于国脉民魂,却时时振拔而刚挺。在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即缩小的国,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国同构的情结始终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潜意识,即使迈向现代化社会成为现代国家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人生底色。但现代社会毕竟是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法制社会,建立在对个体权利尊重基础上,立足社会建设的独立单元的家庭。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结构、家国情怀中,所谓的“家”是一种大家族的概念,非今日三口之家的小单元可同日而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被消解,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人的自由成长和发展,更多接受现代教育,追求人格独立、经济自主,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迈向了契约型的现代社会。由小单元的家而至大社会,最后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民主、独立、平等和文明等成为基本价值追求。因此,在乡村文化复兴和国家文化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重点阐释,使之与现代文明意识和时代条件相结合。今天,在总体的现代、后现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乡村已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信息网相互链接起来,高科技特别是数字化网络技术已缩短了与城市的空间距离,乡村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乡村文化的复兴与精神的生长应成为乡村振兴追求的目标。有学者指出,“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面临着复兴与发展新机遇。”^[5]可以说,走向现代化而有别于城市化的乡村建设才是乡村振兴的正道。在文化意义上,“乡村是我们精神文化的故乡”,“乡村问题是我们的精神问题,农村问题是我们的现实问题”^[6]。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而不是想象性的审美化的乡村才是一幅真实的乡村图景,它在新时代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中有着参

考价值,供给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一种田园风光的生活方式。

就现实性而言,乡村有着悠久的传统农耕文明,乡村一直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场域,既承载着农民一切生产生活方式,又延续着乡村文化的发展。灿烂的华夏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乡土社会的繁荣,也积淀了今日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基因库、文化根基。历史上,“礼失求诸野”的话语表述与田园文学的持续发展,一再表明乡村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隐秘恒久的渊源关系。洞悉其中的奥秘,在乡村文化复兴过程中,既要立足现代性视野,更要警惕畸形的市场意识的扭曲而产生的文化乖离现象,最终导致对乡村文化内在机理和生命力的阉割,进而使乡村文化复兴沦为城市文化附庸的乱象。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只有尊重历史和传统,才能挖掘出地方性的特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助燃剂,而过度的商业化喧嚣的只是文化的浮与表皮。可以说,特色文化与旅游价值的深度融合发展,才是乡村振兴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古老的大树、池塘、水井,通常都是乡村的标配。如何使它们成为点燃乡愁的记忆?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是发展生产力,真正还原乡村青山绿水的原貌、原色,就要尊重乡土文明的本体价值,而不能使乡村依附于城市、成为城市的附庸或边缘化的他者。因此,乡土文明的重构必然是综合的整体性的,不能是单一项目的,可以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思路,为乡村就业提供新的平台,继而确立乡土文明重构的坐标和参照系。实践表明,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离不开乡村文化复兴,文化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润泽和活力之源,更是乡土文明重构的坚实支撑。当下,亟需深刻阐释和发掘乡村文化,使乡村文化在复兴中彰显乡土文明的现代性价值,使人们对乡村文化有所感知进而提升乡村的活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认识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乡村,不仅有现实的民生意义,更有深远的文化内涵。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产业重点转移,乡村人口外流,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强烈冲击,乡村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生存困境。直面现实,振兴乡村,需要转变观念和思维,真正认识到乡村之美,在

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认识乡村的现代价值,在更高的视野中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进一步探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一定意义上,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是对乡村文化复兴的定位,这意味着不以城市发展取代乡村,不能任乡村荒芜以及停留于记忆。这一点在潘鲁生的《美在乡村》中有基于乡村之美的内生发展思路的重点论述。作者在书中着重论述了“把乡村变迁作为内在的‘软性’变化过程来认识,从根本上把握乡村发展的文化动力,以文化为关键求解乡村发展中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等现实的关系问题”^[7],通过强调恢复和强化乡村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激发其本有的内在动力,旨在实现乡村文化再生产。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乡村,着眼的却是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对于乡村而言,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如何发展、以什么理念引领发展至为关键,它不仅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更是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复兴是一种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它关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的厚植。

洞察现实,雅安城乡一体化共建的实践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雅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文化资源积累深厚。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意产业开发、塑造品牌形象方面形成了富有地方特点的雅安实践,其着力点就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2018年5月在雅安召开了首届“文化传统与文化强国”的中华文化论坛,由四川省社科院牵头起草并获得与会专家学者赞同,发表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乡村的“雅安倡议”。雅安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被誉为“熊猫家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边销茶(藏茶)生产基地,被誉为“世界茶源”。“黑茶鼻祖、千年非遗”,雅安还是中国藏茶的发源地和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地,享有“中国藏茶之乡”的美誉。雅安生态博物馆是四川省第一家生态博物馆,主要展示了雅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记忆。这里有雅安丰厚的生态资源,大熊猫的前世今生,以及“家在

“清风雅雨间”的丰富多彩的民俗和人文景观。名山蒙顶山为世界人工植茶第一山、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圣山。蒙顶山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了与蒙顶山茶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是集收藏、研究、展示蒙顶山茶为一体的重要场所,彰显了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新时代重要的创意文化产业资源。公元前53年,植茶始祖吴理真在蒙顶山五峰之间驯栽野生茶树,开创了人工种茶的历史,使雅安名山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人工植茶发源地。唐玄宗天宝元年,蒙顶山茶始作贡茶,一直沿袭到清代。唐宋时期名山开始以茶换马,设立茶马司,专司茶马互市事宜,皇帝多次颁诏“名山茶为易马用”。描绘蒙顶山茶的诗文至今千古绝唱,如“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等。在雅安这里,贡茶文化、茶马文化、茶技文化、禅茶文化等交相辉映,在城乡文化资源的整合中形成文化品牌,以城乡文化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满足了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茶马古道是一条商贸之道,一条民族融合之道,一条多元文化交流传播之道,更是一条文明价值的传播之路。它既是一个绵延千年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这里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累和文明积淀,有着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坚韧、不屈、自强、开放的基因,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精神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文化空间。如何激活这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助力地方经济发展、造福民众,充分展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力量?雅安的实践表明,现代条件下,茶马古道的文明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传承、创意激活、载体建设、文化产品进行传播,使之与现代人的生活、年轻人的时尚化追求相结合,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中健全文化设施、培育文化主体意识、激发社会文化活力、保护文化权益,使文化传承与公共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创意产业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在相互促进中供给高质量的生态产品、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提升的是文化经济的价值,传播的是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理念,弘扬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面对如此丰厚的文明积淀,如藏茶传承了南路边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

茶文化,发掘了“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创意资源,使茶旅融合发展形成特色品牌。中国藏茶村是灾后文化产业重建项目和国家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已建成的区域有藏茶文化展示馆、藏茶品茗展销区、藏茶主题酒店、藏茶生产线、藏茶体验馆、西康民俗康养中心、世界茶种园等。依托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借助创意文化产业及其现代生产加工技艺、市场营销体系,以文化产业链的整合提升藏茶的品牌价值,发掘茶马文化和禅茶文化,融入藏汉和老西康的独特风情。这种特色文化产业开发不仅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兑现了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还在品牌塑造中建构了“雅安形象”,展示了雅安的文化创意创新能力。就地方实践而言,雅安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建构中的文化品牌塑造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雅安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天府之肺”的生态资源富集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多供给优质的生态产品,积极发展康养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形成品牌效应上大有可为。此外,在利用“动植物基因库”的生物多样性优势,特别是大熊猫的发源地(熊猫老家)的独特资源禀赋,塑造大熊猫文化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塑造熊猫文化品牌上还要放大效应。在发掘、阐释“茶马古道”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蒙顶山茶、雅安藏茶,提升茶文化的附加值上还有很大潜力。

回到乡村文化复兴的根本,我们深刻认识到改变态度和思维方式至关重要。惟此,我们必须形成乡村文化复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的普遍共识,明确要以乡村文化复兴修复农民的文化自信、乡土文明自信(而不是逃离乡村)的共识。在实践中,乡村文化是一个杂糅性的概念,它包含乡村的公共信仰文化、乡土民俗手工艺文化、乡村建筑民居文化、乡村教化的传承(文化礼堂、乡村祠堂等)等。乡村文化的复兴不可急功近利、大干快上,它需要一种“明白”,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成果积淀。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一个潜移默化、不断养成的过程;我们不能以发展城市文化的模式来建构乡村文化,也不能以西方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类型思维来解读中国乡村文化;新农民尤其是“中坚农民”是乡村文化复兴的主体力量,但政府的力量不可或

缺,政府对乡村的关怀重在营造环境,让农民普遍“热起来”,鼓励文人、艺术家、有情怀的工商业者(新乡贤)走进乡村,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复兴的浓厚氛围,感染村民不断提升文化自豪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因此,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最大限度调动亿万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复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越发瞩目中国,这使得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和阐释越发迫切,乡村振兴的意义格外凸显。乡村振兴的内涵之一就是乡村文化复兴,而乡村文化复兴旨在实现乡土文明的一种价值重构,这种价值重构是为中华文明的崛起输血,使之更加昂扬、内敛和包容,更加具有文化的韧性。因而,在价值的意味上乡村文化复兴关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的厚植,其意义不可尽述。经由乡村文化复兴,推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

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在互为本体的敬意中实现“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这是乡村文化复兴可能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龚建文.奋力开启江西乡村振兴新征程[N].江西日报,2017-12-04.
-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 [3] 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 李静等.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5] 张孝德.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与“三高技术”的三维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5).
- [6] 刘亮程.乡村是我们的老家[J].天涯,2010,(3).
- [7] 潘鲁生.美在乡村[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65.
- [8] 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责任编辑:来小乔】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ivilization Value

FAN Yu-gang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intended to focus not only on material things, but also spiritual lif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ims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valu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simply measured by economic value. Its value t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leva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be overstated. It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for our unwavering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tended to realiz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rural culture and urban culture through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so as to pus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community”.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community” is to seek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ly, lay a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a cultural pivot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ulture; local civilization; “re-villagization”; “moder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community”